

“鲁研”之“新发现”，推陈出新，若出其里。解析了鲁迅饭桌上的菜谱，透视了先生手稿中被涂掉的文字，现在又来计算“鲁迅一生究竟有多少女人”？这样的“研究”，似乎可以“重新审视”一位文学巨匠，更似乎可以“一举推倒”鲁迅的道德形象了。

然而拜读这“鲁研”的“最新成果”，却免不了哑然失笑——鲁迅有多少女人呢？除了众所周知的朱安许广平，还有多少“风流逸事”呢？还有许羨苏，说是许广平的这位同居女友，“对鲁迅生命相当重要的部分表现过女性特有的关怀”，至于什么“关怀”，连“发现”者“也不知道”，只知道鲁迅南下，“每到一处，有明信片告知行踪”，这几张明信片，于是就成了“拥有”的证据。二曰萧红，这位鲁迅在文学上最忠诚的粉丝，被算作“女人”的根据，也只有

一条，那便是“经常来看望先生”，于是这个萧红，便也列入了“女人”的单子。三曰马珏，“据考证”，这朵北大的校花，“与鲁迅有过一种微妙的情愫”，证据何在呢？没有。但马珏终于还是计入了“拥

一老则老故事是这样说的,80年前,宜兴蜀山西街,一家不起眼的小茶馆里,一位名叫王寅春的紫砂艺人,遇到了一位贵人——著名金石书画家潘稚亮。潘公精通书法篆刻,在金石书画界素有“切玉圣手”之美称。这次一见如故的会面,对王寅春以后成为壶艺大家的影响十分重大。潘先生很欣赏王寅春的壶艺,告诫他要走自己的路,决不要拘泥于古人,要从一个只会模仿前辈作品的工匠,转化为有自己风格的艺人,首先要敢于在茶壶上署自己的名字。潘公还给他刻了一方“王寅春”的印章。

那次谈话,对于王寅春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那一方印章,一直在王寅春心头占着一个重要位置。这枚弥足珍贵的印章也伴随着他,直到他走完自己的艺术人生。

王寅春少时学艺,颇为艰难。他父亲王金宝将他托与上袁村紫砂名手赵松亭门下学艺。但赵松亭不知什么缘故,转身就把王寅春交给作坊里的艺人金阿寿,那金阿寿技艺实在不敢恭维,只会做些“行货”(一般日用品),且性情暴躁,经常无故找茬,叱骂寅春。这样很快三年过去了,王寅春学到的壶艺少得可怜,赵松亭看了王寅春的壶,觉得太差,根本就不是做壶的料。于是某日吃饭的时候,他客气地给王寅春嫌了一个“黄雀包”,王寅春一看,浑身冷汗。江南旧俗,辞退伙计一般不便直说,老板总是在吃饭时,给要辞退的伙计嫌一块用豆腐皮卷成铺盖样的肉卷“黄雀包”,意思就是卷铺盖走人吧。

但是,王寅春最终没有走,倒不是其父为他说情,而是他通过了赵松亭在最后关头布置的一场考试。春笋总要出芽发力的,就是石板也压不住。从此赵松亭处处留意他,指点他,还为他刻了一方印章“阳羨惜阴室王”。惜阴,珍惜光阴也。逆境中的王寅春一直把这方印系在腰间。到1920年的时候,王寅春已经脱颖而出,以一款“朱泥水平壶”闻名,那壶泥色红润,胎薄而轻巧,放入水中,似轻舟缓行,极为平稳。壶客趋之若鹜,上海的铁画轩也来请他制壶,后来干脆把他接到上海,这样王寅春的命运又有了一次转折。

王寅春在上海除了仿古壶,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一款“倒把西施壶”,至今仍是紫砂界公认的经典之作。那壶似圆腴丰盈的少女乳形,饱满而富于张力,流溢着一种蓄势待发的气韵。

王寅春无论紫砂光器、方器或筋囊器,堪称样样精通。特别是筋囊器创作,有开山入之称。其技艺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的《半菊壶》是业界公认的筋囊器经典作品。通体洋溢着韵律的美感。壶身那一瓣瓣镶砌的长条形块面,气韵饱满生动,是筋囊器中的扛鼎之作。《汉均壶》和《裙花提梁壶》《梅花周盘壶》等作品,既有苍劲刚道、挥洒自如的风韵,又有融庄重与飘逸共美的特点。壮年时期,他的新作很多,有的来不及起名,便以“寅春壶”问世。收藏家们有点像守株待兔,住在他家附近的客栈里,只要他的新作品一出来,大家就趋之若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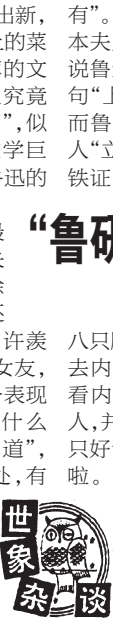
《串顶壶》,是王寅春晚年的一件力作。整个器型就像一个端坐的仁者。低眉,静目。怀想那风云际会,万籁俱寂。可以想象,王寅春制作该壶时的心态,应该是平和而静穆的。那种波澜不惊的柔板风格,贯穿了器型的每一个细节。平宽底,鼓腹,圆盖,曲弯流,嘴口朝天;壶钮如帽缨双环相串,诸趣盎然。从头到底,自有一份恬淡从容。仁者走遍天下,洗尽铅华;沧海白云,心间流过。甲巳卸,剑无刃,胡笳寂寂而丹心无眠。该壶何以不是王寅春自己一生的写照呢?

这便是《串顶壶》,锋芒褪尽,素朴内敛。仁者归来,入定即是百年。世间炎凉,一切随缘吧!

仁者归来

读壶记之三十四

徐凤



世界万象

有”。还有内山书店后面的那位“山本夫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了——说鲁迅曾给山本夫人去信,说过一句“上海寂寞”,这就成了“心曲”,而鲁迅去世时,噩耗传来,山本夫人“立刻失声”,这更成了“苦恋”的铁证,这样的“推理”,已可称“悬空道德形象”了。

“鲁研”又有“新发现”?

司马心

八只脚”了。更荒唐处,是说鲁迅常去内山书店,不是买书,也不是去看内山完造,而是为了看这位夫人,并于这点,连“发现者”自己,也只好说是一种“也许”,一种“推测”啦。至于把羽太信子又拿出来凑数,把八道湾那个老掉了牙早已戳穿的飞短流长又翻过来说一回,就更不是什么新花样、“新发现”了。

对于这种以无中生有甚至指鹿为马的方式来“探索”的“鲁研”,也有有识之士斥之为“别有用心”——“老石头”骂过了,“老顽固”骂过了,“没有长篇”也没有能够否定鲁迅,于是便来另辟蹊径,编造鲁迅的“情史”,以便“一举击倒”……

依我所见,这在当下,倒是

一种十分流行的模式,大凡说一个伟人不是神而是人,不是都要挖他的隐私么?说他吃五谷杂粮还不够,更要“揭示”他的“七情六欲”,“再现”他“拥有的女人”。如果大红灯笼妻妾成群,再加上“外面彩旗飘飘”,那就再好不过了,似乎就合乎“人”的标准啦。如果没有红杏出墙,如果十分“谨小慎微”,那么巨匠如何走下圣坛,先生又如何“活生生地来到我们中间”,又怎能“大众化”也即娱乐化呢?所以一点影影绰绰,就要捕风捉影,所以即便连踪影也没有,也要生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关于鲁迅拥有多少女人的“最新研究”,或许真不是为了“贬损”,而恰恰是一种“拔高”,只是这种“高”度,是按照时尚的标准和流行的模式来“打造”而已,除了流俗媚众、夺人眼球,并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

“鲁迅饭”还要吃下去,“鲁研”还会不断有“新发现”,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也可以当作笑话看——但不管怎么说,做出“鲁迅拥有多少女人”那样数学题的应可凭此戴上顶“文学史博士”的毡帽,这是理当恭喜他的。

石西民的最后一篇文章

张煦棠

汇报五十周年》的集子。不料,隔了两天,闵孝思同志又给了我一个电话,说:“我问了主编文集的西民同志的儿子,这篇文章本来是收入文集的,是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了。”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祝文汇报五十寿》,在石西民同志一生的著作中,也许称不上是传世之作,但也决不是应景之论;西民同志写这篇文章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文汇报五十周年》的专集是从1987年仲夏开始组

羡慕别人同学聚会,我的母校嘉善中学很小,几经变迁,老同学也不知在哪……前不久我接到电话,通知我参加市二中学110周年校庆,我恍然大悟,嘉善中学已变成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校庆当天人山人海,但我怅然若失,竟找不到一个老同学,也许嘉善融入市二不被人所知。

1968年,弄堂里“70届”集体进了嘉善中学,是宋景香老师挨家挨户送入学通知。说实话,这一场地狭小、破旧简陋的民办中学让我失望,它与临近百年名校市二中学相差甚远,校园之小可用“袖珍”形容,操场犹如天井,上体育课只能来到文化广场南侧马路上,老师吹着哨子,见到车辆指挥学生及时避让,做操常常由此中断。其实,嘉善中学1962年创办时还要破旧,在嘉善路上一片棚户区中仅几间破平房。上世纪50年代倡导“光荣妈妈”,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出生、入学高峰,因陋就简的民办学校解决了当年的人学难。

十年浩劫,盛行读书无用,批判师道尊严,课堂上闹哄哄的,没有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课,只有工基、农基课,要学工学农。学生虽没有如山的作业和沉重的考试,但除了高喊政治口号,就是玩耍嬉闹,交白卷成了那个时代的“英

雄”。学生们最欢闹的一刻是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晚上收听完重要广播,连夜打起红旗,敲锣打鼓游行“报喜”。那时,红色人流浩浩荡荡,要数嘉善中学队伍最短,远没有一些名校的队伍“气势壮观”。

老师们当年被称“臭老九”,有“工宣队”进校改造他们,在学生心中没那么神圣、崇高。嘉善中学是条件最差的民办中学,有些老师因出身不好或政治问题被“发配”于此,整天老老实实唯恐再被批斗。那时,课堂上没有朗朗书声只有疯狂口号,没有文明规范只有野蛮行为,常见学生在打架斗殴,戏弄老师……一代人学业就此荒废,当我们变成知识青年走向四面八方时,其实没有多少知识可言,许多人为虚度光阴而后悔。

我记得,有个漂亮女教师上课,有同学用粉笔纸团扔向在黑板上写课文的她,女教师被激怒了,回眸时那怒不可遏的眼神,至今在我脑海中“定格”。但女教师望着更多渴望读书的孩子,强压怒火继续讲课。哪怕身处困境,哪怕身受凌辱,老师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尽管身在民办中学,待遇“低人一等”,但嘉善中学的老师没有愧对老师这一称号。

最后一年我们在奉贤学农,吕立人、劳乃珣两位老师望着我们担忧地问,你们没学到什么知识,将来如何工作?他们利用学农间隙偷偷讲课,并组织学生自学文化课,我们最早的求学梦由此萌芽。回到市区,我们不再贪玩嬉闹,或找来“文革”前教材自学,或埋头图书馆读书……饮水思源,正是嘉善中学的老师在那个疯狂年代里充满忧虑的发问,才使我们如梦初醒,重捧书本,并自觉走向知识之路。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校园记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充满故事。有一则曰“落水兰亭”,是说宋人赵孟坚,曾从他人手中易得“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喜甚,乘夜回棹(驾舟返回),至昇山,大风覆舟,行李皆湮(淹)溺无余,彝斋(即赵孟坚)立浅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介吾意也!’因题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这位画家,可谓对艺术的喜爱到了痴狂的程度。不慎落水时,为了保护手中的一幅珍贵字帖,他把自己的性命安危也置于脑后。

“价值观”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源头。在遇到两物利与害相权时,人们总希望将最大之“利”归入自己囊中,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舍去,即使舍去的是自己的生命!在他看来,舍生取“利”与儒家所宣扬的舍生取“义”是完全统一的。这时候的“利”已经不光是物质之“利”,而是他心中的神物。

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许多舍身为公的动人事迹,可以说都是这种价值观的实际体现。共产党人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也是一位“性命可轻,至宝是保”的践行者,“至宝”,就是革命的理想和目标,就是人类的解放和世界的大同。至于什么样的东西(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才是“至宝”,不同人会有不同答案,但有了“性命可轻,至宝是保”的信念,一切英雄行为均能找到合理的诠释。

怎样不拘一格培养艺术人才? 敬请关注。



夜光杯



一叶轻舟 (中国画) 万跃申

美术学校、美术团体和杂志报纸“三位一体”,构成了民国时代上海美术公共传播的基本模式。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所早期私立美校的建设发展正是这一模式的缩影,成绩斐然,且无论美育抑或新兴美术的宣扬和传播都能与当时的宣传媒介紧密地结合,在当时的社会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结社在当时的文艺界是一个普遍现象,围绕着上海美专相继出现了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艺苑、摩社等相关的重要社团,每个社团的兴盛与学校发展的各个特定时间段连接在一起,彼此促进,从浅尝辄止到完善成型的摸索过程反映出上海美专作为美术传播场域的实际生态。以学校或社团为基础,创办了《美术》《葱岭》《艺术旬刊》《艺术》《艺苑》等专门刊物,宣扬美术、发表艺评;学校成绩展览会、各社团展览积极举办的同时出版社团或展览画集;在《良友》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当时的大型报刊上定期登载学校招生、迁址、声明、出版各种相

关消息及实时报道、评论上海美专及其社团展览情况令学校在公众视野里拥有了持续的关注度,宣传媒介的介入无疑对以上海美专为中心出发,实践艺术家们胸怀的艺术理想、培育美术公众、散播新兴艺术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于1919年9月发起组织、以上

“三位一体”的传播模式

小桐

上海美专教师为主、知名画家参加的“天马会”为例,从成立当年在江苏省教育会举办“天马会第一次展览会”,至1928年因政局动荡而停止活动,天马会先后举办九次大型展览会。天马会的活动频繁,当时《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申报》、上海艺术学会的刊物对此常有报道和评述,也使得天马会成为20世纪20年代享有社会声誉的美术团体之一。又如1928年由上海美专教师创办,王济远主持,关良、倪貽德为

们的《文汇报五十周年》于1987年12月编辑出版时,西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无比深情、无限沉痛地在《祝文汇报五十寿》的作者名字上加上了黑框。西民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倾注了对《文汇报》、对《文汇报》人,不,也是对广大新闻从业人员

研究指导的艺苑绘画研究所,既举办“艺苑画展”,又出版《艺苑画集》、创办有《艺苑》画刊,艺苑同仁团结友好、悉心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在社会上声誉日增,当时有“犹似沙漠中的一朵蔷薇”之说。再如1932年取Muse的法文音译为名成立的“摩社”,其众多成员倪貽德、刘海粟、傅雷、潘玉良、王济远、庞薰琹、张若谷、段平右、关良、李宝泉、吴弗之、周多、张辰伯等人皆为上海美专教师。该社最卓著的影响是编辑了《艺术旬刊》杂志,当时任主编的倪貽德在编辑后记中讲到编辑这本刊物的缘来:“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志,有一个华胥社的组织,曾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集华胥社文艺丛刊。现在我们不妨将它扩大组织,出版定期刊物。这是在中国现代艺坛很需要的事情。”可见除了教学、结社,通过纸媒传播艺术已成为当时艺术界人士的一种共识。

十日谈

上海美专春秋

怎样不拘一格培养艺术人才? 敬请关注。